第 九 章

留守陕甘宁

参加洛川会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了消息。那时我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形势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平津是进入中国腹地的咽喉。平津危急，就是整个华北的危急；华北危急，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危急。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吞并全中国。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请缨杀敌。七月十三日，延安的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的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七月十五日，延安各界又召开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延安的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敦促国民党政府立即定下坚决抗战的决心，采取积极的行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

日军从平津沿交通线步步进逼的消息频频传来，在前线抗战的军队失利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我们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仍旧没有明朗的结果。为了早日开赴抗日前线，红军中已经进行了改编的教育，部队的整编工作也在进行中。在此期间，“八一”建军节来临，传统的庆祝“八一”的运动会也都准备就序。我去毛主席那里汇报，运动大会是不是如期举行，是不是借此机会进行抗战动员。毛泽东同志思忖了一下说，很好，大会如期举行，就叫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八月一日，延安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组成的各代表队及群众集聚在南门外体育场。在升旗仪式上，第一次将镰刀斧头和青天白日旗一同升起，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决心。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亲临大会并作了慷慨激昂的抗战动员。号召同志们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准备到抗日最前线去。那时在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十分高涨，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即奔赴抗战前线杀敌。

在“八·一三”上海事变炮火的催促下，南京政府终于与我党答成协议，将红军改编后开赴山面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为了研究确立军队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

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是在八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接受任务后，我和杨立三同志马上驱车出发。那几天正赶上连日大雨，我们沿着延安—西安的公路冒雨行驶。

此对大雨倾盆，对面几步就不见人，河川里黄水滚滚，山梁上不时有塌方，道路泥泞，很不好走。我们乘一辆大卡车，七十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停了下来。这里距洛川城大约有十几里路，又靠近大路，来往比较方便。进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穷，没有几栋象样的房子，有几处庙宇，也破破烂烂。杨立三是副官长出身，打前站最有经验，这次也发了愁。选来选去，还是一个庙稍微好一些，便收拾了一下准备给毛主席住。村边有一家姓冯的先生开的私塾，有几间房子，我们和冯先生商定，让小学生们放几天假，借了这个房子做会议室。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都是号的老百姓的房子，条件都比较差。我记得后来博古同志还找我，要和我换房子住，结果到我的住处一看，条件更差，只有一扇门板还是架在水缸上。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会议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共开了四天，参加会

议的有二十几名同志。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凯丰、博古、张国焘等，还有军队及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聂荣臻、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林彪、周建屏、张文彬等同志，我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军队的领导同志大都是从三原赶来的。因为当时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党中央将主力部队开赴了西安附近。这也是党中央把会址定在洛川的一个原因。

洛川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透彻地分析了形势，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这个团结，一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目前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比较过去有了进步，但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我们党要竭尽全力为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奋斗，坚决反对违背此方针的一切错误方针，维护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强调团结的另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的政策要做相应改变，

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既团结农民各阶层起来抗战，也要团结开明绅士和地主起来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做相应改变。这一点引起了与会同志的讨论，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转变，中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面前，怎样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上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出征以后，我们主要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些想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部队出征抗日就要打仗，只有打了胜仗，才能扩大红军的影响，提高人民的抗日信心，才能站得住脚，从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着重从中日双方战争的特点出发，说明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是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也最有利于发动群众。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党内的思想也逐步从理论到实践

的结合上统一起来。

洛川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红军开赴前线的主要方向是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就是发动群众的工作。人民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军队就有来源，武装就能扩大，我们的敌后政权就能巩固，根提地就能发展，从而才能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洛川会议上，有少数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陕甘宁边区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党中央扎根于陕甘宁，使它成为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提地的建设。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我谈过，并且已经确定我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箝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我心悦诚服。

在会上，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根英明的。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在陕甘宁安然无恙，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威为联系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同时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反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生产自救等各个方面，向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编领》，正确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特别是确定了我军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的任务和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指导方针，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面日益显示出它的远见卓识，这也就是洛川会议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建立留守兵团

洛川会议以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改编后的三个师的主要负责同志，从洛川赶回部队，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我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回到延安后，我即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的部队。

开始，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组成，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分别编成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的炮兵、特务、工兵、辎重营，并划定驻防地区。当时，陕甘宁边区已有十七、八个县（后来，按照国民党三三三次会议划定，陕甘宁边区为二十三个县）。我们将这些县划分为东地区和西地区两个留守处。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整个部队约九千余人。

陕甘宁边区是十年内战以来我党我军得以保存的唯一

的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东面，隔河相对的，是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对亦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里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磨擦反磨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的几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正常的生活秩序。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政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我们首先考虑并着手时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留守兵团的这部分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大都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令，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留下之初，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是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

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怎样在这种基础上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我去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当谈到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如何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时，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这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那样地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感到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谓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

志文，政委李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鄜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兵团成立了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的大会，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他风趣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这支武装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给留守兵团的全体干部以很大的鼓舞。这次会议确定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的团结”为兵团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我在会上提出“任务重于生命”做为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号召留守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使部队建设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不久，部队便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

靖匪除暴安民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团很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二十三县境内，共有土匪四十余股，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枪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人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边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据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外号赵老五）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千茂股匪；还有的是与托派有勾结的反动武装，如甘泉的李钦武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我和兵团几个领导千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

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对于军事围剿的战术问题，还曾经有过一点争论。记得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了军事顾问职务的李德，曾提出要采取平推的战术，派大部队齐头并进。理由是采取这种战术声势大，力量集中。李德在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在红军大学讲过课，以后又被派来帮助我们训练过骑兵，有时也参与研究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这个人以军事专家自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严重，又孤芳自赏，固执己见，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曾经吃够了他那一套瞎指挥的苦头。从实际情况来说，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采用他提出的这种战术，只能象赶鸭子一样，把土匪赶跑，而不可能把土匪消灭。今天赶跑了，部队一离开，明天土匪又会窜回来，继续为非作歹。我当时对李德说："土匪刁滑得很，昼伏夜出，分散活动，到处流窜，哪里会'集合'在一起，让你去打呀！我们的战术，一定要适应土匪活动的这些特点。"他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耸肩膀，老大不高兴。后来我把同李德的争论，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他笑了笑，

说：没有李德就不行吗?!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开始，我们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二千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之纵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房梁一带，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一百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六十余支。在这同时，我七一八团在鄜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企图为匪的民团两股，获枪七十余支。

翌年二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用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例如，盘据黄龙山地区的股匪，被我清剿部队击毙一百多人，获枪七十余支，只有很少一部分逃离边区。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被我部队全部歼灭。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追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

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砂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甘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已经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这样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

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九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马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二十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六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著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七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已经是夜深人静。我来到毛泽东同志的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经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态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

本肃清了?!”我便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大约一年，即一九三九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磨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据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极惨。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又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

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其实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当时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我们当时虽然知道这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我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改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我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我回电。子是，我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一句应酬的话面已。一九四〇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捣毁我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四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九人。我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了死刑。一九四一年二月，我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

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九百余发。

除赵老五以外，当时气焰嚣张、作恶多端的政治土匪，在三边，还有原系恶霸地主武装，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保安大队长的惯匪张廷芝。这股匪徒祸害群众的手段极其残忍，不少妇女被他们糟塌，不少群众和村干部被他们吊起来用火烤，用枪托、棍棒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一九四〇年，张匪还曾借故围攻我驻靖边的部队，我一营长被惨遭枪杀。在鄜甘地区，有被国民党洛川专署收编为“反共军”的著匪夏老么。该匪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连续作案五起，除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外，还杀死我干部和群众多人。在关中一带，有逃离边区多年，受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唆使，又于一九四〇年五月窜回边区大肆抢劫烧杀的惯匪李仰之。对于边些有政浩背景的土匪，我们一般也都是运用两手：一面由我致电国民党的有关军政当局，揭露土匪的罪行，要求“国军”配合剿除。这一手，当然不起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些土匪的后台老板，唯恐边区不乱，哪里还会来配合我们剿匪！但这一手还不能没有，“先礼后兵”嘛，我向你通报了，你也无法否认他们是土匪，下一步我就好使用另一手。这一手就是武力清剿。在我剿匪部队的围、追、堵、截下，上述股匪，有的被击溃，有的又逃离边区，有的被彻底收拾了。例如匪首李仰

之，于一九四〇年六月被我捕获，公审后就地正法，人心大快。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一九四二年九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的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四个多月之内，作案达四十余起。闹得最凶的时候，平均两天要发生一次抢案。而其突出特点，又是专以抢劫捣股我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我区乡政府机关，刺杀我单独活动的军人和地方干部，抢夺枪枝为主要目的。这些匪徒在几个月之内，就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十人，绑走和打伤十三人，抢走长短枪十七支，劫走大批财物和八千余万元现金。当时我正在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固守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留守兵团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而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

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也就成了我经常思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日军将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当时我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留守兵团当时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多里的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又拥有强大的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能担当得起来么？开始，少数同志显得信心有些不足。必须使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兵团干部会议上，我给大家讲有利条件，在干部中统一思想。我说，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的。但是我们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在黄河东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还是晋东南的敌后，都有我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渡口又少，且东岸多土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山，西岸多悬岩峭壁，过河只能漕渡，无法架桥。这样的地形条件，显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日军要想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也并非易事。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所永远不能比拟的。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加上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保卫河防的任务，是完全能担当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一九三八年春，当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120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115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129师为策应115师和120师作战，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即使后来，120师、115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以后，留在河东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巩固千里河防，仍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当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河防紧张起来，留守兵团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紧急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这个团不久被调归120师建制）；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政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其中构筑工事一项，任务最为繁重，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防御战，纵有黄河天险，但要抵挡政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要吃大亏的。河防部队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记得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西北行营和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先后派员前来“视察”，都赞扬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后来河防战斗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重视了防御工事的构筑，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lib.com

才大大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

对于河防战斗，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这种凭险固守的战斗，究竟应该怎么打，对于我和同我一样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各级指挥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是边打边总结经验。

三月十二日，进犯我晋西北兴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附炮二十余门，第二天到达黄河东岸。十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敌军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三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都队拥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惶退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四十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我河防都队仅伤亡六人。

同年五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三十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十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缴战，歼敌二百余人，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缴获步枪机枪二十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荫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待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缴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认真进行了总结，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这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荫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扬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

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侦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对于上述经验，我们在作战会议上交流过。一九三九年春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作了分绍，并且指出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年夏天，我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时，除了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还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六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战斗。那是在我到达绥米地区以后不久，日军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

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地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敌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又象以往一样，大炮、飞机终日对我河面阵地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把汹涌澎湃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我大批援军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支增援部队是经我同意，连夜从边区内地调来前线的。他们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的，斗志非常旺盛。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当时随我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访问我，要我谈谈对这次战斗的看法。我着重指出，要注意敌人战术的变化，还赞扬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后，记者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他们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炮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同志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

“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〇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西，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我：“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他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

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未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漫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我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一九三九年九月，王震奉党中央的命令，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米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三五九旅出征两年，屡建战功，守备河防，更是

一支劲旅。这年十一月，王震轻车简从，来到延安。我们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王震向我述说了三五九旅辗转恒山地区，打击日寇的英勇事迹。他侃侃而谈，性格豪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和王震正式在一起工作的开端。记得当时王震带来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件黄呢大衣。他说，这是战士们追歼日寇时缴获的战利品，留个纪念吧。我向王震介绍了河防斗争的情况，一起商讨了防务。我还向他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复杂斗争形势，特别是绥米一带是当时国民党制造磨擦事件的主要地区之一，我们在一起研究了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在以后的河防斗争中，三五九旅借鉴和发展两年来河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特别是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这年十一月下旬，日军一万多人，分四路又进占了我碛口、孟门等地，当敌一部二千余人集结河滩，放船漕渡时，我三五九旅河防部队突以机枪猛烈扫射。敌人鼠窜登山，复以大炮还击，妄图压制我火力。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缴战约五小时，日军支持不住，分头退去。这一仗，又毙敌百余，我仅伤亡十二人。

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日军兵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时，三五九旅更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河东我军，连续作战，打击敌人。例如，三月九日，柳林敌军三百余人，进犯李家庄，与我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被我击退。

十三日，柳林敌军派出五百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我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敌人又不得不退走。三月三十一日，柳林敌军一千五百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我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震以奖励。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督战，劳绩甚多，尤以三月战役为最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励。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就这样，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七十余次。日军的进攻，多数是在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从时间上来说，日军进犯最频繁也是最猖狂的时期是在一九三九年前后。西在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120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严

重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以重创，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